



## 日俄衝突的意義

蔣廷黻

蘇俄倘要出售中東路，這是可了解的。因為現在日本在東北的政治和經濟的勢力大可以致中東路的死命。無論蘇俄售與不售，這條路是要成爲日本囊中之物的。但是東路出售的交涉簡直是個悶葫蘆。既然要出售，蘇俄何必費

來是否會平靜過去，我們也不能預料。我們敢斷定的僅僅是這一點：日俄雙方均不會爲幾千萬盧布而致決裂。倘要決裂的話，必不是爲中東路本身，是爲中東路所代表的。那末，這條路代表什麼呢？

事來與日本講價呢？主顧相差的幾千萬盧布值得這樣小題大作嗎？難道蘇俄要爲幾千萬盧布而與日本決裂嗎？我們要記得：近日日俄間風雲的原因——至少直接原因——是路價的爭執。因爲講價不成，交涉於是停頓；停頓以後，「滿洲國」就開始逮捕路上之俄方重要職員，於是塔斯社就發表日本的秘密公文，於是日本的報紙就大肆譏罵，甚至聲言有斷絕邦交之可能，於是日本政府才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這樣一來，謎上又加謎了。因爲日本何必這樣着急？肉在口邊，再容忍幾秒鐘有什麼大了不得？其實日本口裏的東西還未完全吞下去，何必又進一口？在蘇俄方面，何必在這個時候發表所謂秘密文件？這些文件有何秘密可言？至於說責任在日本，不在其傀儡，這是天下共知的事實，有何證明之必要？且何止此一舉？

這個謎不是我們不知內情的人所能破的。這陣風波將

這條路原先是帝俄侵略中國的利器，現在還是蘇俄在遠東的第一道防線。蘇俄雖是共產主義的，其人民與他國人民一樣，絕不願意放棄他們祖先遺留下來的產業。何況這產業是這樣值錢呢？遠東不保，則全西比利亞將無門戶了，將受日人的封鎖了。反過來說，這條路是日本大陸帝國最後的障礙物，也可說是日本在遠東的霸權的最末遺缺。這個霸權，用不着說，不利於我們，亦不利於蘇俄。這兩年來日本的進取，首蒙其害者是中國，其次就是蘇俄。不但此也，日本的遠東霸權也不利於歐西及美洲各國。蘇俄現在不過對此霸權盡點抵抗的責任，間接表示蘇俄關於日本霸權立場是與歐美一致的。塔斯社所發表的祕密文件不是爲日本人看，是爲中國人及歐美人看的。這幕戲不是爲日本人唱的；是爲我們，尤其爲歐美人唱的。所以日本人性塔斯社侮辱日本的忠誠，而怪蘇俄有意排撥離間。

日人所顧慮的不是日俄關係的惡化，反是日本全歐國際關係的惡化。如果日俄的衝突有什麼嚴重性的話，其嚴重性就在乎此。

關於日俄的衝突，我們很容易發生各種誤會。第一，這衝突很像一個世界赤白的衝突。其實，這個衝突與赤白色全無關係。日俄之間倘無赤白的區別，這衝突也是不能免的。在帝俄時代，列寧和杜洛斯基還是無名的宣傳者的時候，日俄曾經戰過。但是現在俄國既是赤色的，日本人就更更有口實了。他們樂得使人相信日本是亞東反赤的惟一防線。去年日本向國際調查團所提出的主要說帖，就是形容遠東赤禍的急迫和日本如何是遠東惟一的救星。倘若日本能使世人相信現今日俄的衝突是赤白的衝突，那日本的外交戰已成功過半了。但我們試自問：倘若俄國現在不是共產主義者當權，日本就會放棄向北滿發展的計畫嗎？當然是不會的。反赤的標語不過是日人的宣傳資料；日本的政策決不是因為反赤而有近二年的舉動。在蘇俄方面，她也不能以赤色對白色為其外交政策，因為這樣的政策，實行起來，等於蘇俄對世界。蘇俄的外交家縱惡至萬分，他們也不得採取這個立場。蘇俄深知現代所謂白色的帝國主義者之間的衝突和仇恨遠過於他們對蘇俄的仇恨。這是

蘇俄外交活動的機會。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爲勢所迫，亦有樂與蘇俄携手以抵抗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者。現在國際的分野尚未到白色與赤色相對的局面。目前日俄所爭的與主義無關，明明白白的就是兩國在遠東的勢力。

第二，因為日本近兩年對我們有極大的侵略，許多外人以爲日俄的衝突或是我們出路之一。我以為這是一種極危險的誤會。日俄的戰爭不是遠東問題解決之路。無論是日勝俄勝，中國是得不到好處的。乙未馬關條約以後，俄國乘機向我施行侵略，一則修中東路，再則強租旅大。到庚子年，俄國更進而佔全東北三省。那個時期是俄進日退的時期。俄國彼時氣餒之高並不在當今日本軍閥之下。日人遂一方面大講中日親善，一方面又勸歐美標榜中國的領土完整政治獨立及列強在華機會均等。中國要人如劉坤一及張之洞就是那時候國內親日反俄派的領袖。他們以爲親日反俄是中國的出路。在西洋方面，因日本所標榜的主義是與英美所標榜的相同，亦樂與日本政治的及金錢的資助。在庚子以後的數年，俄國狂進的時候，她在外交上是處孤立的。就是她同盟法國，對她的遠東政策，亦心懷疑懼。日本彼時的地位正相反；她好像名正言順，儼然像全世界對俄討伐的代表。到了戰後，日本遂反其戰前一切的主義

戰後我們所受的日本的壓迫正與日俄戰前我們所受的俄國的壓迫相等。而英美在南滿不能享受均等的機會亦與戰前相等。美國對此尤其憤慨。日俄遜聯合以抵制美國的投資。三十年前的日俄戰爭不但未解決遠東問題，且反使此問題更加嚴重。

現在形勢是日進俄退的，俄國近來的舉動，倘有國際意義的話，不外向歐西及美國送秋波。她的目的就在取得三十年前日本在國際上所有的優越地位。倘此舉成功而事

實發展又與上次日俄戰爭一樣，我們是得不着任何便宜的。倘若勝日，則日本在華北的權利及勢力將為俄有；日若勝俄，則日本之遠東霸主地位將更鞏固了。所以現在與三十年前一樣，日俄兩國的衝突是不能解決遠東的。

這問題的永久解決必須有兩個條件。一個是遠東有個強而有力的中國。一個是日俄英美願對此問題的解決作同等的努力。在這兩個條件未達到以前。所謂解決都不是解決，反是增加糾紛。

十月十五日

## 一個日本的人才統計

君達

獨立評論第七十一號內顧毓琇先生極力主張『專門人才統計』的重要，並且略舉了幾個中國專門人才的數字。因此使我回想到前幾年所看見的日本大學畢業生的統計。

這個統計載在『科學的日本』書上，其數目是截至一九二五年為止。茲將日本國立大學自從創設以來到那一年的畢業學生分科列表如左：

校別	法學	文學	經濟學	理學	醫學	農學	工學
東京帝大	一一，四九九	二，九三八	一，三五五	一，三二一	四，〇六四	二，七六三	五，六一二
京都帝大	三，一五五	八二五	八九六	五〇二	一，七七二	六五	二，一九四
東北帝大	七四	七四	一	四六九	三二七	一	二八九
九州帝大			一		一，五二八	四一	九二八
總數	一四，六五四	三，七六三	二，二五一	二，二九二	七，六九一	二，八六九	九，〇二三

以上總數共計是四萬二千六百一十七人。這單是說國立大學畢業的，此外當然還有私立大學，專門學校以及外國留學的，總加起來人數大約也不甚少。但他們的專門人才究竟要以國立大學的畢業生做中心。日本最老的國立大學是東京帝國大學，始創於一八七七年，但自一八八六年（即清光緒十二年）始成現在制度，分設文法理工醫五科，後又陸續添設農學及經濟二科。京都帝國大學創於一八九九年（即中國戊戌變法之次年）初設法醫二科，其他各科皆後來添設，農科還是一九二三年新添的，所以畢業人數不多。九州帝國大學創始於一九〇三年，原為京都帝國大學之醫學分院，後乃添設各院，成為獨立。東北帝國大學在一九一〇年始設，當初只有工學院，後乃添加醫工文法。所以在右表內畢業人數之多少，與各校各科設立年份之長短，是很有關係的。但是我們如果從各科的總數來互相比較，也可以得到一些關於日本專門人才分配的大略概念。

從上表看來，畢業人數之多第一是法科，第二是工科，第三是醫科。這三科每科皆在七千人以上乃至二倍此數。從這個數目推想他的意義：法學人才是國家及社會組織革新及建設上重要份子，所以他們人數最多。中國現在有

一部份人對於此類人才不甚重視，或可以說此類人才有時自己已不甚重視，這種觀念在日本似乎是沒有的。工科是物質建設的必要份子，所以其數居第二位，其中理由是很顯然的。醫科也是科學應用於人生之重要一端，其效顯，其用廣，故居第三。其餘各科畢業人數都在二千幾百到三千

以上，其次序是文學，農學，理學及經濟學。文學在外國也似乎不像在我們中國許多人所想像的無用。農。理，經濟三科人數大致相等，而經濟學是近年來蒸蒸日上的一科。

照那時日本本部人口六千萬人計算，每一千人還得不到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一人，但亦相去無幾。按此比例，則中國四萬萬人應該有好好的大學畢業生四十萬人了。又照上列總數與各科人數相比得法科佔總數百分之三十五，工科佔百分之二十一，醫科佔百分之十八。其餘各科皆在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九之間。據顧毓琇先生所說的清華大學畢業生統計，也是法科第一，佔總數百分之二十八，工科第二，佔總數百分之二十四。大致的次序到也差不甚多。

日本大學畢業生雖然是法科的最多，但教授的人數却總是工科及理科的為最多。例如東京帝大法科教授只三十人，而工科教授有八十九人，農科五十二人，理科四十五人。京都帝大法科教授只二十二二人，而工科有五十六人，

理學四十四人。

現在專就在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方面從事於專門研究工作的人才，看他們的分配統計如何。這也從『科學的日本』那本書上計算出來，其材料是日本文部省的調查的。第一是在政府機關裏面，雖然附屬在行政機關，但仍有許多技術及研究組織，用了許多專門人才。把他們大略分組造成一表如下。

性質	機關數目	專門人數
地質	二	六〇(?)
燃料	二	三五
礦冶	二	三〇(?)
權度	一	七九
化學工業	五	八四
工業	五	一八六
農林	九	三二〇
蠶絲	二	四八
牧漁	七	二八五
衛生	六	一八四
專利	一	二五
電工	一	二六五

鐵道	陸地測量及軍事研究	水道測量及海軍研究	航空	天文及大地測量	氣象及地球物理	共計
一	二	二	一	五	一三	六七
五六	五八〇	五〇〇(?)	四二	五六	一三二	三,〇四七

以上是指官立的機關而言，還有私立的研究機關，大多數是由實業家或大公司捐資設立的，其規模也很可觀，也做成一表如下。

性質	機關數目	專門人數
地質	一	一二
生物	二	一〇
農林	二	二五
衛生及醫學	二	八四
理化研究	二	三七〇
電工	三	九四
冶金	三	九〇
化學工業	三	八一

造	船	一	三四
工業	試驗	四	二〇〇
共計		二三	一〇〇〇

從以上二表看來，日本差不多有四千個專門家從事於科學及技術的研究。除了陸海空三項近于軍事研究以外，還有三千人在做着自然及應用科學的研究工作。其中應用方面研究的人格外多，如工程，農業，衛生及醫學皆是。科學研究之中，理化的人最多，因為是最近乎農工醫的應用之故。氣象及地球物理人數不算很少，因為其中包括地震及火山研究，這二項都是日本所特多的自然現象，所以研究以人也多些。做地質的人不甚多，因為日本土地甚少。

## 定縣平教事業平議

叔永

在『鄉村運動』與『復興農村』熱潮正高的時候，向來為各方所推崇的定縣平民教育事業，忽然連續不斷地受到各方面的非難，這大約也就是表示一般人對於鄉村運動的注意罷！各處非難中的最嚴厲而最重要的，要算中委張溥泉先生的談話。據世界日報十月二日濟南通信所載張先生對於定縣平教事業的批評，大約可分為四層：

獨立評論 第七十三號 定縣平教事業平議

而且做關聯工作的人都已算入別門，又因當統計的時候，日本地質調查所適因地震被焚後規模大加縮小的緣故。生物的人不見得多，也因為許多人已算入農林漁牧諸類裏去了。日本的疆域比中國小十六倍，人口比中國小五倍，而各種專門人才則比例的實在多出許多了。

統計儘管統計，我們還須認清人才之質比量更為要緊，有名無實的專門人才數目雖多也是無用的。而且許多專門事業，經驗學識都不是一時三刻所能養成。日本人固然各事多肯認真努力，但他們在專門學術界的，也很有許多不能登峯造極的地方。中國人如果邁步追趕，出頭地決不是不可能的。

一，定縣事業，『直不曾一騙人東西，誰從當地經過就請誰去參觀。』

二，定縣事業，『每年虛糜國幣二十四萬，已有十餘年，耗款有五百萬之鉅。考其成績，實不過一隅之發展，何補於整個之農村？』

三，鄉村運動，用不着甚麼高深的學理。『現在一般

村治學者皆鎮日試驗研究，講述高深的學理，反使人以為辦理鄉村事業如此之難，莫不望而生畏。」

四，鄉村事業，歐美已行之有素，可資借鏡，不必閉門造車，獨出心裁。大可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放大眼光作去，由中央及各省縣共同努力，完成整個鄉村建設。」

以上談話各點，曾經平教會總幹事晏陽初先生去電質問，張先生并不否認（原電亦載十月三日世界日報），則知此段談話，實足以代表張先生對於平教事業的觀察。我想張先生雖然很不喜歡平教總會招待參觀，罵他是騙人的東西，但此次對於平教事業的批評，必定是參觀以後所得的結論。作者在兩年以前也曾得到一個參觀的機會。現在把自己參觀所得的感想，寫出來做一個平議，大約也是各方所願聞的罷。

一，張先生以為平教會拿他的事業來騙人，誰從當地經過，就請誰參觀。這個話殊不盡然，即使有之，也不足為平教事業病。據我們所曉得，平教會的人，正因參觀者的衆多，深感到應接不暇之苦。這是觀於每年春間，他們登報廣告限定招待參觀的期間而可知道的。可是要他們謝絕一切參觀，這當然也不行，因為他們還得向各方募捐以

維持其事業的進行。所以我說招待參觀不足為病。至於參觀的是否騙人的東西，則完全以該東西的本身價值而定，這是我們以下要討論的。

二，張先生說，定縣事業每年虛糜國幣二十四萬，已有十餘年，耗款有數百萬之鉅。這似乎也有點錯誤。我們以為中國的許多教育事業都可以說是虛糜國幣，唯獨平教事業不能說這麼一句話，因為平教事業經費的大部份，都是由私人募捐來的，而且大部份是由華僑及外國募集來的。這個經費來源的錯誤，正與國聯教育考查團報告書所說的平教經費百份之六十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擔任一樣。我想平教會應該多多的發表他們經費的來源及收支報告，以免這樣的誤會再三發生。

可是討論經費的來源，不能影響到張先生對於平教事業本身的批評，那便是所說的：「考其成績，實不過一隅之發展，何補於整個之農村？」我們以為這一層是平教事業的根本問題。有詳細討論一下子的必要。

三，平民事業，乃以整個的農村建設為目的，非以一隅的發展為目的，這是平教會同人所再三申明的。所以，如其有人批評他們花的錢太多，他們就會立刻告訴你，他們的事業是要研究出一個中國各省各縣可以普遍利用的方



法或方式來。如其就一縣看來，這個方法或方式與代價是太昂貴些，就中國一千九百餘縣分攤起來便不算昂貴了。同樣，如其有人指摘他們工作的計劃須時太久，他們也可以拿同樣的理由來作答辯。因為一個推行全國的計劃，用了六年或十年來研究試驗，本來不算過於遲緩的事體。可是這裏包含下列的兩個問題，是平教會同人所不能忽視的

(一)是平教會在定縣試驗的結果，果能應用到全國各縣各鄉村去而不發生問題嗎？

(二)是鄉村建設的工作，果然須如晏先生們的精工細緻甚至於使人『望而生畏』嗎？

這兩個問題頗重要，讓我們細細的說明一下。

平教會標榜的四大教育與三大方式(見下注)，有的是可以推行全國而不發生問題的，有的是因地方情形不同，合於此地者未必適於彼處的。舉例來說，如像文字教育，公民教育，我們中國自來保有『書同文，行同倫』的歷史，是不會發生地方問題的，可是關於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就大大的不同了。拿農事工作來說，北方種麥，南方種稻，北方宜畜牧，南方宜養蠶，這種大差異固不必說了。就以平教會生計教育部所注意的牧畜一件事而論，據實業

部調查所發表的報告，山東、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省農家多數的畜產是水牛，黃牛，雞，豬；而山西，河北，甘肅，寧夏等省農家多數的畜產是馬，驢，騾，羊。所以即以牧畜一項而論，在北方研究出來的結果，未必能應用於南方。至於北方種植棉麥的方法，不能應用到南方稻蠶出產的地方去，是更不用說的了。照這樣看來，所謂生計教育的試驗，至多只能得到一個『到農家去』的普通方法，至於所用的特別方法——即改良農作的方法——在當地成功自然也關重要，但在平民教育的全體計劃上是不應該有多大關係的。關於衛生教育的研究，也可以作如是觀。明白這個道理，則平教會許許多的試驗，都可以減省下來，而人與時的兩方面也就可以得到另外的發展了。

關於第二個問題，我們以為如平教會的過分講求完備，是不必要的。舉例來說，在他們藝術教育裏面，有廣播無線電教育研究設計及攝影研究設計等項，并且以製造廉價的收音機為研究成績的一種。依我們看來，這種工作都不免太早，且不必要。我們只要看看普通城市中能利用這種設備的有幾多，便可以估量他在鄉村教育中所占的地位。鄉村的生活本來單簡，平教會如能就他們原有的音樂戲劇各方面加以改良，已足以調劑他們乾枯的生活。至於

無線電照像等設計，新則新矣，但不曉得牠對於平民教育的效果，敵得過對於一般人所發生的『畏懼』嗎？復次，平教會原來的計劃，要在十年或六年之內，除盡當地的『文盲』。我們以為此種試驗，乃絕對的不必要。『除文盲』的工作，只好如耘田去稗一樣，做一分算一分。若說除非全數『文盲』除盡，這運動不算成功，我想天下無此笨人。且即使在一定時間之內把定縣的『文盲』除盡了，將來他處能不能如法泡製，按時程功，當然還是問題。所以我們以為這限定時間除盡文盲的計劃，又是晏先生的一種精工玩意，於平民教育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說到此處，我們不能不承認，張先生所說的鄉村事業，用不着做得那樣難，使人望而生畏，實大有道理。我們尤其贊成的，是張先生所說的鄉村運動用不着甚麼高深的學理，至於現今一般村治學者，鎮日試驗研究的是不是高深學理，還是一個問題。我們所要指出的，是此種運動本來單簡易行，並且有些問題，是應該依地方情形，隨發見隨解決的。若把這件事當成一個深奧無窮的學理問題，須把各方面的情形一一想到，各種解決的方法一一研究出來方纔起手去做，那便是俗語說的耗子鑽牛角，恐怕有此路不通之虞了。

末了，我們要問鄉村事業，是不是可以把『歐美行之有素的』成法搬來運用，而不必『閉門造車，獨出心裁』？我們的答語，當然是『不能』。因為既名為鄉村事業，這些事業必定是十分的鄉村化，地方化。即使在中國，恐怕此地方的成法也不能應用於另的地方，何況要以歐美的成法行之於中國鄉村呢？關於這一點，我們以為平教會的主張最為正確，牠的貢獻也值得稱贊。因為牠的主張是要深入民間去發見他們的問題，而他的貢獻，是在這些問題中間找出解決的方法來。不管牠的成績怎樣，牠的效果怎樣，我們以為牠的方向是不錯的。平民教育這件事，顧名思義，應當以普及全民為最後的成績。所以這件事應由政府以全力推行，而不可責之於私人團體的義務上的熱心。張先生的批評，所謂『不過一隅之發展，何補於整個之農村？』是對的。不過這個責任，是應該由政府負呢？還是該由平教會負呢？我們希望大家切實的考慮一下。

二十二，十，十五

（註）四教育，指文藝教育，生計教育，衛生教育，公民教育，他們是拿來治『愚』，『貧』，『弱』，『私』四種病的。三方式，指學校，家庭，社會等方式，他們是用來進行以上四種教育的。

## 我們在農村建設事業中的經驗

費達生

請先提出一個中國農村建設的困難問題。熟悉中國人口狀態的人，都知道中國人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每個農民平均只有五畝上下的土地。每家平均五人，則中國的農場平均只有二十五畝。這種狹小的農場，使機械無法引入以增農村的收入。用人力工作的生產方法下，二十五畝土地，除養活五個人之外，實在沒有多大餘力來供給發展中國工業的資本和原料。加上了天災人禍，中國的經濟在現代的世界之中，祇有向沒落的路上了。

中國農民太多已經為留心中國社會的人所共喻的了。但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這種情形呢？若是中國有一天能趕上西洋，只要四分之一的人就够供給全人口的食料，其餘的四分之三的人幹麼呢？我們可以舉一個事實來說明這問題的嚴重性。

去年太湖流域有一部分地方，天熱雨少，大有發生旱荒的危險。本來農民在這種情形之下，是最忙碌的，一天到晚要踏水車灌田。普通的水車，除了養牛的人家外，都是由人工來轉動的。三四個人一天不息的工作，並不能灌多少田。去年政府裏因為注意了農村事業，所以預備了許

多電力打水機，低價租給農民。以電力代人力，又便宜，又省力。任何經濟學家都會贊成這種辦法，而認為一定能增加農民幸福的。但事實却不然。在蘇州附近有一個賭鎮，據說去年暑期因打水機的應用，利市百倍。我們親見農婦來哭訴她們的丈夫或兒子，因為有了機器，可以不必工作，上賭場裏去把家產都蕩盡了。弄得農村中六神不安。

這一件事明白告訴我們機械引用到農村中去，並不是一件簡單而容易的事。社會決不是一個各部分不相聯結的集合體。反之，一切制度，風俗，以及生產方法等都是密切相關的，這種關係在中國因為經過了數千年悠久的歷史，更是配合得微妙緊湊。派克教授 (Coker E. Park) 在他論中國一文中稱中國是一個「完成了的文明」(finished civilization) 就是這個意思。所以要為中國社會任何一方面着手改變的時候，一定要兼顧到相關的各部，和可能引起的結果，不然，徒然增加社會問題和人民的痛苦罷了。

或者有人說這種情形是由於中國都市工業的不發達。若是都市中開設了大工廠這輩閒空的農民就可不到賭場中去，而吸收到工廠中去作生產事業了。或者甚至有人說，

上述現象是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時所免不了的，等農村人口過剩的壓力增加到相當程度，都市的工業自會發達。歐洲近代史的初葉不就給我們很好的証據麼？但是我們覺得

這些說法的人，似乎應當考慮到現在世界經濟的狀況，和中國所處的地位。用我們幼稚的技術，微弱的資本，要和列強爭一日之長，若沒有可以憑藉的特長，似乎是很難的。換一句話說，我們要追上歐洲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似乎已太遲了。就以熟知的紡織業為例罷，歐戰時，因世界競爭的力量薄弱，居然發達一時，但等到歐美能力恢復後就一蹶不振了。這是證明中國並不是沒有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才能，而是沒有機會。

在討論中國鄉村和都市的問題時，還有一點應當注意的，就是中國的都市實有二種不同的性質。第一種是舊式的「城市」，如蘇州等是。這種城市的發生並不是由於工商的發達，而是在於一輩脫離土地工作，依收租為生的地主們安全的要求。從經濟上論，這是一種消費的集團。第二種是新興的都會，如上海等是，它們是西洋文明東渡的產物，是現代的，最重要的是工業和商業，所以可說是生產的集團。論中國都鄉關係的，往往不分別此種差異，熟

資本的耗費，自然對於農村有極壞的影響。熟悉後者的，則認為兩者是相成的，因工業和農業本來互相賴以發達的。

以為發展都市可以吸收鄉村過剩人口的，自然是指新興的都會。但是新興的都會在中國却有一種特別的性質，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因租界的存在大都不能認為是中國的。除非承認外國經濟及政治的侵略對於中國實際生活上是有利，而我們願意享受這種利益的話，我們似乎不能認為上海式的都會的發達是一件可以引以自慰的事。這一點，在這裏不能深論，希望有機會再作另文討論。

要建設中國農村，勢必引用新式生產方法，應用機械；而直接地把機械送到農村去時常會發生很多不良的社會結果。一方都市的工業，受外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勢力的阻遏不能發達。新興都會的發達，在族國主義的立場上論，又是和中國有害無利的事。至此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相信這個問題一定已絞盡了多少人的腦汁了。我們覺得解決問題最好的辦法，還是作實際的試驗。試驗的結果，才是最佳的答覆。所以在這裏我們願意將我們十年來在這些問題上工作的經驗，貢獻於國人，以作解決此種問題的

在民國十二年時，我們在江蘇省立女子蠶業學校（請翫關）推廣部担任推廣改良太湖流域一帶蠶絲事業時，有機會可以時常到農民中去演講和勸導。我們講的不是任何空洞的主義或是任何不可捉摸的傳說，只是告訴他們如何可以增進他們蠶事收入的方法，如教他們把蚕室消毒，飼育的適當時間等。我們教他們的方法是經過科學的核准的，所以聽我們的人，實際上就能獲得利益。以科學的技術去取得農民的信仰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因為科學知識的本身已給我們正確的保證。所以在十四年時受我們訓練的各戶所繅的絲，比土絲市價增加了四分之一。十五年開弦弓村（屬吳江縣）就有七十多個女子願意上我們的學校受特別的技術訓練。這年的改良絲價比土絲增高三分之一。於是全村轟動，都願意接收我們的指導了。

但是我們不久就覺得發展農村第一雖需要科學的生產技術，但單是技術是不夠的。因為我們有一種成見，覺得一切科學上的發明，應當用來平均的增加一般人的幸福，不應當專為少數人謀利，甚至使多數人受苦。以養蠶製絲而言，我們願意盡我們先得的科學知識用來促進農民一般的利益。但是要達到這目的，單靠技術的改進就感不足，而一定須有一適當的社會制度了。

### 獨立評論 第七十三號

我們在農村建設中的經驗

我們覺得人生中最使人鼓舞而能獲得最大安慰的，也許就在為人服務後，人家對自己的感激。這種精神上的糧食使我們有勇氣能為我們理想的新制度作十年的工作，我想的新制度的原則是很簡單的，就是要使每個參加工作的人，都能得到最公平的報酬。同時在經濟活動上，要能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營業絲廠相競爭而不致失敗。我們絕對認為社會工作的人不能一天不注意社會價值的問題。經濟生活和其他的生活一般，不過是人類要達到一種目的而發生的活動方式。所以我們不能不時顧到「這一種目的。這目的就是美滿的人生，是社會的價值。同時在我們的經驗深信一個為社會服務的人，至少一方面要有一種社會價值的鑑別力，一方面要有一種宗教性質的熱忱。在我們這一種小小的事業中，我們幾十個人能放棄安閒的小姐生活，在烈日暴風中奔波，而覺得樂在其中的，在我個人看來，除了一種宗教性質的熱忱之外，是沒有憑藉的。素來沒有宗教訓練的中國人，使他不能在血液中散放出一種不為自己打算而為人服務的熱忱，或是中國前途最大的一個障礙。

十五年時，我們因為技術上的方便，已實行稚蚕公育，就是在幼蚕時代，各家所飼育的蚕放在一起，大家輪流

負責，一則可以省事，二則可以便於監督。到十七年因為木機所製的絲，切斷太多，不能賣高價錢，所以在技術上已需要用汽力推動的繅絲機的設備。於是我們就在這個時候，規定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的章程，先在開弦弓實行。合作社最重要的性質，就是一切生產器具俱由參加工作的農民所有，一切管理及行政的權力，由合作員掌握；一切利益由合作員公平分配。這計劃制定之後，不數日，加入該社的農民，就有四百餘戶。經濟方面不足之數，由我們四處設法籌劃，再由學校方面借一座引擎，按期付款，預期於五年之內一切債務及機械俱由利益項下拔清。開弓弦生絲精製運銷合作社就是這樣在民國十八年成立的。

詳細辦法在這裏不能詳述，簡單的說來，各合作員共同飼育稚蚕，長大後分開於各戶，由指導到各戶監督。結繭後共同烘繭，存藏於合作社內，先取價若干，俟製絲出售後，全價歸回。合作員中還有訓練者充當繅絲工人，由技術員指導繅絲工人及職員和其他工廠一般，俱按期付工資。

普通沒有到農村中去過實地工作的人，常以為農民是愚笨不可教的。但是從我們經驗看來，農民是最善良而馴服的人，並且很聰明。像這種複雜的合作事業，現在一切

都已由他們自己辦理，我們除運銷及技術上加以指導外，一切都歸農民自己負責。該社成立已經四年，這四年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安靜年頭。國際市場的停滯，絲業的衰落，直接給這小小的試驗以巨大的威嚇。但是在這四年的經歷中却給我們發現了他特具的能力，使他可以堅立，並且可以解決在本文開篇時所提出問題的參考。我們可以先把他和營業絲廠比一比。

製絲業中最大問題是在原料。若一廠不能控制他所收原料的性質和品種，他的產品總不易得到圓滿的結果。但是在營業絲廠，這種控制是極困難的。因為蠶戶沒有組織，就不易使他們養一律的種，和受技術上的監督。雖則現在已有工廠用各種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但決不像合作社的容易。合作社的稚蚕是公育的，同一品種的。飼育時受指導和監督，凡合作社員就有服從指導的義務，不然合作社就可有加以強制的權力。

第二點，是他費用的較輕，費用較輕是由於多方面的原因。在原料方面，我們不必有大注流動資本去購買，運輸方面，須到絲製成了之後才往外運，分量很輕，費用頗少；設備方面，地價低，租金輕；人工方面，因生活程度低，勞力成本亦低。凡此種種都使成本減低。據他們三年

的報告是：

十八年，每担成本一〇八八元，出售最高價一二〇〇兩，該年純利總額一〇，八〇〇元。

十九年，每担成本一四四四元，出售最高價一一〇〇兩。該年虧耗三〇一〇元。

二十年，每担成本一二五三元，出售最高價一〇一〇兩，該年虧耗四一八三元。

十九、二十，兩年的虧耗並不是賠本性質。因為每年要拔回開辦時的債款和付清每股東應得的股息。這兩年雖則因絲價的跌落，但是尚能于還償付息後，只差了幾千元的數目。

第三點是這種組織的經濟伸縮力。這是他最大的長處。他使在裏面工作的人，不成爲一單純的工人。她們依舊是兒子的母親，丈夫的妻子。享受著各方面的社會生活。不使經濟生活片面發展，成一座生產的工具，失却爲人的資格。因爲他們參加這種經濟活動，並不需要她們全部生活的重新調適；工廠就在鄉間，同伴就是本來的鄰里，每天回家可以享受家庭的幸福。在另一方面這種經濟制度亦因是獲得他的伸縮性。譬如繭子已繅完，就可宣布停廠，工人就可在家裏，經營其他事務。不如城裏工人一旦沒有工

做，就發生生活失調的痛苦。在工作忙的時候，工人們都很自願的加工程製，因爲他們所具的態度和營業絲廠中的工人不同。他們的工作是好像是爲了自己，愈努力愈滿足，所以絕不會發生罷工的風潮。態度上的轉變，使許多都市中勞工問題不會發生，同時使這種組織成一富於伸縮性的機體。

第四點是他的生存價值大。富於伸縮性的機體遇到打擊的時候，容易維持。最顯明的一件事，就是一切營業絲廠非每年能獲到利益，就不能維持，因爲股東的目的，並不在給工人們工作的機會，而在股息的收入。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地方，資本向高利的流動率愈大。所以企業家一定要使他的工廠能維持一定高度的利率，不然立刻會有倒閉的危險，但合作社則不然。他們的目的，大部分在維持工作的機會。只要每人能有工作做獲得工資，雖則合作社的資產負債表上有虧耗的數目，亦是願意極力維持的。易言之，合作社的維持是建築在活動的每人生活實際的利益，而營業絲廠則建築在股東的息上。兩者相去自然很遠，結果就是前者的生存價值大了。

我們把合作社和營業絲廠相比較，目的是在說明中國要和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相競爭時，這是可能的生路

。我們的制度根本上是要使經濟生活融合於整個生活之中，使我們能以生活程度的伸縮力來和資本主義的謀利主義相競爭。這實在就是蘇俄現在實行的原則。他們用國家的力量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政府的腐敗，不易使人有什麼希望，而我們所試驗的制度的確亦是一條可以達到這目的的路，也許比較上更適合於缺乏國家觀念，以家庭為礎基的中國社會。

其次，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如何引機械進入農村的問題。我們從絲業入手，一方固然是由於我們特殊處境的原因，但是所以能不發生像抽水機一般的情形，是值得我們留意的。我們並不把機械直接去代替已吸收了多量人的事業，同時我們所吸收大半是女工。女子在村中本來是很忙的，她們的功能是瑣雜的，所以本來繅土絲的婦女，因現在有了機械繅絲，不必再作這種工，並不會覺得無事可作而去胡鬧。而且，在鄉村中家庭的組織很重要，家庭的經濟是公共的。所以一家若本來有二個繅土絲，現在只要一個人去繅機械絲，在一家總收入上並無出入。在二人

的經濟生活上就不會發生什麼改變，只是一個人可以有空餘來管理旁的事罷了。在這種富於調濟力的辦法中，機械才能慢慢地輸入農村，成為農民生產的工具。我記得幾年前燕大教授泰嬰氏就在中國評論報上發提倡農村小規模的副業。從副業入手，非但是增加農村收入的良法，亦是的用機械的平坦大道。

我們把這一些經驗貢獻於關心和參加農村運動的人，雖則或許這些辦法只能適合於太湖流域的絲業，但我們希望同一原則可以應用於其他地方，其他性質的事業上。本來，我們深信一切辦法只有從實地試驗中得來，人家的成績只能作為參攷的材料罷了。農村運動最重大的條件，還是在從事此種運動的人能有服務的熱忱和技術的訓練。沒有服務熱忱，不以事業的成功為人生中重大安慰者，很不容易到農村中去受種種生活上的困苦。沒有技術的訓練，就是到農村中去，亦是容易獲得農民的信仰，實際上，不會有什麼重大效果的。

## 旁觀者言

聖羽來稿



初是新文化運動，繼之以東西文化問題，繼之以人生觀的大論戰。人生觀大論戰以後，中國近代史似乎轉入了另一方向，——革命的空氣掩蓋了一切。近年來唯物史的研討頗為活躍；然而這只呈一而倒之勢，也不過是革命高潮中的一個漩渦而已。今年的形勢只有江河日下：東三省以外，更找上了熱河；廢止內戰以後，還加演四川大舞台與察哈爾一幕。到處只是悲觀，到處只是政治上的紛亂同不安。在這一種情況之下而有選印四庫全書，而有因選印引起的南北議論，不能不算是一個意外——不帶政治臭味的一個論戰，這是「革命成功」(?)以後破天荒的一次! (?)現在此番爭辯將近結束了，在將結未結的當兒，乃有田炯錦先生的「名流與景印四庫全書」(時代公論七十五號)同「再論名流與景印四庫全書」(同上七十八號)兩篇大文，來添一個錦上之花，不禁使看戲的人有餘音繞樑之感。不過這餘音不是那餘音，而是政治的意味放到這一次爭辯上面的。一種回聲而已!

田先生的文章牽涉到「名流」，牽涉到「北平圖書館」，牽涉到個人，這自有負責的人去理論，我是一個旁觀者，犯不着去為他們辯護。我只願意談談我個人讀田先生之文以後，所發生的一些零碎感想。

田先生兩篇文章，洋洋數千言，結其大端，其所論者無非兩點：(一)此次的爭論，不應對政府格外苛責；(二)不應對有價值的事，予以批評。通篇語氣只覺得官氣逼人，活像一位政府發言人的口吻！

本來在現今的中國做老百姓委實是太難了！對現在不滿是反革命，隨遇而安，則自己吃了苦頭。然而中國的人畢竟是樂天知命，抱長期不抵抗的人居多，對政府的措施，只有隨順，絕無違抗。所以在中國做官辦事，而說辦不通，而說無成效，那只應該叫那些抓印把子的官兒們反躬自問，老百姓是不負其咎的。老百姓是只配做順民，根本就沒有「責」過政府，更說不上「苛」。這一次對於選印四庫的爭辯，或者要算是例外了。此事只不過選印幾部破爛古書，絲毫牽不到政治，所以有幾位書呆子們才搖筆為文，各効芹獻，萬想不到田先生會加以「苛責」政府的罪名。「苛責政府」再進一步，豈不就是「反革命」麼？田先生固然沒有拿出這一頂大帽子來，但在好搖筆為文的書呆子們，不能不有履霜之懼呢！其實為政府着想，這幾年來的老百姓作寒蟬仗馬也就够了。在這一次選印四庫珍本的爭論上，如能寬大為懷，任其放言高論，未嘗不可以使人感到中國的前途尚有一線的生路，最少在陳死人的書裏面，我們

還可以跑一蹄野馬。如其在這一點小小的園地裏都不能隨意的說話，那豈不令人有人間何世之感？田先生又說「歐美文明國家的人，對政府並不責望過甚，並不吹毛求疵」。但是我們的國家並非歐美的國家，而我們這些老百姓也够不上同歐美國家的「人」相比。至於我們的政府同歐美國家的政府相比，想我們此刻尚無此胆敢以表白我們自己的感想，只好請田先生原諒則個！田先生想是到過歐美的，也許聽過外國公園裏的公開宣傳；如其不錯的話，那我們便可以彼此「心照不宣」了！

我們不妨再下一句轉語：如其老百姓的意存阻撓同過分責備，能使今日的當局會因此而灰心，因灰心而至於玩下野或出洋考察等等的把戲，未始非古語所說的「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所可慨者我們讀了田先生的危言，只有受寵若驚耳！

其次田先生對於所謂善用筆桿的通儒，也痛罵了一頓，可謂快人快語。這一段罵語之中又牽涉到胡適之先生的哲學史（田先生原文未舉名，茲姑懸測如此，確否待考）以為是由於吹毛求疵的批評，而致中下冊怕人批評，不敢輕易付印。窺田先生的主張，似乎是有價值的著作便不應批評，只可譽揚；否則就等於黨同伐異，豈能附於不能見

，「此風不改，恐將來吾國文化上的落後與破壞，要和政治上一樣」。胡先生的哲學史之中下冊不敢輕易付印，其原因是否如田先生所說，這要問胡先生自己，我們不敢代為置答，也不敢肆意猜度。不過胡先生的哲學史上冊出版後，因有人不滿意於胡先生的主張而批評，因批評而引起一般人對於中國哲學史更深的興味同研究，因研究而發現了許多新的理論。這種批評同因批評而得到的新的收穫，不僅一般人可以擴大眼界，即在胡先生自己也得了不少的觀摩之益，對於他的研究不無裨補；這我想田先生也是承認的罷。如其胡先生的哲學史上冊出版以後，學術界便亦步亦趨，唯唯諾諾，奉胡先生之言為金科玉律，絲毫不敢更易，那中國的學術界還不知道要沉淪到那一步田地呢！把學術上的批評牽扯到政治上去，併為一談，只此一家並無分號，這是田先生個人的創見，我們不敢苟同。至於田先生為當局辯論的話，事實最難辯，用不着我們老百姓去頌揚，也用不着我們老百姓去咒詛。

現今之世，還不會禁止處士橫議，新定的約法上也有言論自由的保障，我希望不至因此一篇「開囀」的文字，而買天外飛來之禍！單就這一點而言，田先生大約也會為